

周有光：继续播撒“德”“赛”之火

□庞 阳

著名语言学家、文化学者周有光先生已109岁高龄了。回顾7年来我与周老接触的点点滴滴，我愿将一些体会与读者分享。

2008年端午节，我第一次登门拜访周老，是以“宁夏平罗国务院五七干校”校友的身份。也许有人会奇怪怎么会有跨越50岁的校友，其实这完全是拜时代所赐——那时，周老是被改造的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而我是随父母下放，在造纸厂切草班出苦力的小童工。命运在38年前有了交集。此行除了探望和叙旧，更是为了向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讨教。

保姆把我们领到周老的书房，周老笑眯眯地握手相迎。他兴致很高，和我们一起回忆那段难忘的“高级劳改”的日子。他笑道：“许多人下去不高兴，我倒很高兴，不后悔。想想看，假如不下放，不到那里去，中国有这样一个地方，我却不知道。”我们谈起令岳飞壮怀激烈的贺兰山，谈起大渠上的沙漠卫士沙枣树，谈起连天大漠中的芨芨草……周老还给我们讲了“9·13”以后开大会，恰遇雁队集体飞过天降“粪雨”的趣事。这件事，后来被许多人引用过。但不知为何，我问当时干校其他的一些长辈，他们都说没有印象了。我想对此惟一的解释是，有“周百科”之称的周老，即使在那困顿的年代，也对自然界的奇妙现象有着特别的敏感；一般的人，自己的愁苦事还顾不过来呢，哪还有精力去关注大雁拉屎的事。

临别，周老送给我几本书：《百岁新稿》《学思集——周有光文化论稿》和《周有光百岁口述》等，对我说，他85岁退休后，“离开艺术的井底”，每日大量看书、看报，“发现井外还有一个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”，他在进行“自我扫盲”。他说：“老来读书，我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：中国、苏联和美国。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，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，掩盖真相。考古不易，考今更难。”

阅读之余，他把感兴趣的东西随时记录下来，写成通俗的短篇杂文，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。从90岁到100岁，集成这些文化杂文集。

那次拜访之后，说实话，我被这位睿智的百岁老人迷住了。那个时候，我正为历史、现实的一些问题弄得很迷惘、很困惑，我开始一本接一本本地读他的书。

我特别注意到他的“双文化”观点。这是与学界普宿季羨林先生很不相同的一种文化观，大意是说，国际文化是世界各国所“共创、共有、共享”的共有文化，正在突飞猛进，覆盖全球。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之中，享受“双文化”生活。

读了周老的书，我有一种“顿开茅塞”、“振聋发聩”的感

觉。于是，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《周有光先生的“双文化论”》。

过了些日子，我突然接到周老儿子周晓平先生的电话，他说，爸爸很喜欢你写的文章，约你去聊天。

我不免有点“受宠若惊”，赶忙前赴赴约。先生见我，非常高兴。打开话匣子，一聊又是两个小时。

原来，先是民盟中央刊物《群言》在2008年第12期上发了我的这篇文章，老作家邵燕祥看到，写了《报周有光先生书》，发表在2009年1月9日《文汇报》上。邵先生说：“您以平实的言语，讲了一个关系人类命运当然也包括中国命运的大问题，深入浅出，举重若轻。”后来，《周有光先生的“双文化论”》又被《杂文月刊》《文艺建设》等杂志转载，还被沈从文之子沈龙朱先生收入周家和张家的家庭杂志《水》；一些网站也转载了，点击率还挺高。

我很高兴，能为传播周老的真知灼见做一点工作。从此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我就去拜望周老，听他谈天说地。周老也时常把他新写的，或者他看到认为不错的文章复印下来，让保姆通过邮局寄给我。

一天，我去看望周老，正赶上他在伏案工作。桌上摆着一台老式电子打字机，周老端坐桌前，正全神贯注地整理自己的文章——从一张三寸硬盘重新存入到另一张盘上，并编目录。周老打字速度很快，他告诉我，他用的是“双打”输入法，一个音母、一个韵母就可打出一个字，而拼音法正是周老所创，可谓烂熟于心。于是这位已逾百岁的老人打起字来竟比后一些年轻人还快。保姆小徐告诉我：“爷爷每天都这样在打字机前工作，一干就是半天！”

这台打字机，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夏普公司面向中国市场研制的产品，周老在汉字输入的关键技术上给他们指导，这是夏普酬谢的赠品。后来随着电脑技术飞速发展，这种小型电脑很快被超越，用的人很少了。但它却一直伴随着周老，成为他文字工作的忠实助手。

就是用这台打字机，他以惊人的速度写作。104岁出版了《朝闻道集》，105岁出版了《拾贝集》，106岁时《文化学丛谈》又如期问世。这些书，在海内外读者，尤其是知识阶层的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一时竟然脱销。令我惊讶的是，在这几本书里，周老都以《“河东西”到“双文化论”》为题将我的文章收入，还加了这样的说明：“改革开放初期，掀起一阵文化问题的讨论。后来，人们的兴趣转变，不再谈文化了。这时候，庞阳女士发表一篇讨论文化的文章，好似夜莺孤鸣，清脆醒目。庞阳介绍周有光的‘双文化论’，用笔简明扼要，胜过周有光原文。周有光反过来介绍庞阳的文章，要点如下……”

这样的评价，令我感动之余又有几分惭愧——本来那只是一篇介绍、阐述周老观点的文章，老人却用这样的方式给我以勉励。人们说起周有光等硕果仅存的“五四一代”知识分子，论起他们对当代文化的特殊贡献，常用“老年人燃烧，中年人取暖”来形容。而周老正像一团继续播撒“德”“赛”之火的明亮火种，温暖、激励、鼓舞着我们这些后来学者，向着人类先进文化发展之路，向着中华复兴崛起之路，探索，再探索。

我曾想为周老写传，为此还特意自费去周老的家乡常州，以及他生活过的苏州、重庆等地采访。后来听说这个题目已有人写，我就打消写传的念头，转而帮助周老整理他的口述录音。有段时间，我常常带着录音机去周老家，把他对录音稿的修正和说明记录下来。但这项工作也因我的一些原因没有持续完成。后来此稿由其他编辑修订整理，以《逝年如水：周有光百年口述》为题出版了。在出版前的研讨会上我拿出了自己当初的整理笔记。虽然不能说有多大贡献，也算是略尽绵薄之力了。

周老曾给我画过一幅“人生轨迹图”：人生像地平线上半轮太阳，从0岁到20岁，是上升期，20岁到80岁，平稳的盛年期，80岁开始，慢慢向下滑落，却依然发着热，闪着光，100岁出局。这幅图对我有很大的鼓励，觉得自己不过才到“平稳的盛年期”之中段。古人云：“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”，而周老早已超越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图，百岁以后发的光，更加明亮。

那些年，常有一些朋友让我带他们去拜望周老，对这样的请求，周老总是慨然应允，热情接待。我觉得，他很高兴与后辈人交往，从来人身上捕捉外界的信息，也将自己一个世纪的人生经验与大家分享。访客除了讨教，还免不了要求题字、照相录像，周老总是不厌其烦地满足他们的要求。周老谦和的态度和幽默的话语，令每一个来访的人如沐春风，留下难忘的印象。因此，他的小书室总是高朋满座，谈笑风生。就在今年年初，我和社科院的张森根先生去拜望过109岁生日的周老，还在他家楼下看到许多鞋套——那都是一天里来拜访的人留下的。

周老的观点，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，相反还引来一些持不同意见者的非议甚至咒骂。对这些骂声，他不仅不烦恼，反而十分欢迎，经常让我们把看到的不同意见告诉他。他说：“真理不怕批评，批评是真理的营养品”，认为有争论是好事，是社会的进步。

人们求周老题词，他题得最多的是“不要从中国看世界，要从世界看中国”，“了解过去，开创未来；历史进退，匹夫有责”。这两句话，显示了周老的全球化视野和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。

井塘村

□匡 松

■赣南笔记·之四

井塘村是我此行重点要去的地方。

驱车往于都县东部，这边的群山起伏更加巍峨。路边有一条清澈的小河。当地朋友告诉我，这条小河是有来历的，因两岸翠竹交洽融汇，绿意盎然，故而得名叫洽河。

洽河从一个村庄蜿蜒而过，这里就是井塘村。

井塘是一个仅有28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。村庄虽不大，但房屋错落有致，一些民居仍可以看出当年的影子。我这次来井塘，是因为这里曾发生过一件悲壮而又充满激情的事情。在上世纪的30年代，一个下着细雨的夜晚，就在井塘村边一个不大的山坳里，搭起一个戏台。雨中的马灯和松明子将台上照得通亮。一群文艺战士，在这个戏台上，在雨中，在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中，为当地群众表演了一场特殊的文艺节目。这应该是中央苏区的最后一次文艺演出。此时敌方的军队已将这里团团包围。演出结束，大家就要分九路突围，所以每一个战士都拿出自己真正的文艺才华表演得尽心尽力。这场演出在雨中持续了三天三夜，附近的近万名群众赶来观看。雨中的山坳里挤得人山人海。

这就是当年苏区历史上著名的“井塘会演”。
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于都河边，开始战略转移。时任中央分局书记的项英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的陈毅，共同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三万余人继续坚持斗争。10月下旬，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从瑞金梅坑转移至于都县的宽田，12月下旬又转移到赣南乡的井塘村。这时环境已经更加残酷。为了激发苏区军民的斗志，也为迷惑敌人，掩护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，1935年2月，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决定由瞿秋白负责，组织工农剧社下属的“红旗”、“战号”、“火星”三个剧社搞一场大型的文艺会演。工农剧社隶属于中央政府教育委员会，从梅坑到宽田，再到井塘，工农剧社一直是跟着中央分局走。中央红军主力渡过于都河后，尽管前方的枪炮声不断，但这个剧社走到哪里唱到哪里，比今天的“送戏下乡”更受群众喜爱。

文艺会演的事一定下来，就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。在井塘村边有一个开阔的山沟，两座小山夹着一块平整的坳坡，是一个天然的露天演出场地。2月7日晚，村里的群众得到消息立刻争相送来桌椅和门板，就这样搭起了一个简陋的舞台。台上挂起煤油灯和松明子，将这个小山坳也映得通亮起来。此时的雨已经越大，但丝毫没有影响群众观看演出的热情。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心里都很清楚当时严酷的形势。所以，寒风冷雨中的台上与台下也就涌动着热烈与悲壮的情绪。这场文艺会演的内容很丰富，有舞剧、歌剧、话剧、采茶戏、民歌、器乐演奏，甚至还有小提琴独奏。我看到了一张当时的节目单。这张节目单已经褶皱发黄，但仍可以闻到当年的气息。节目单上有：《牺牲》《女英雄》《李保莲》《非人生活》《我们的队伍来了》《游击》《堡垒中的士兵》《追击》《你教我打枪》《摸哨》《抢粮》《埋伏》《地雷》《菜刀下的营长》《收租粮》《不要脸》《搜山》《突火阵》《缴枪》《冲锋》《王大嫂》……从这些节目不难想象内容，也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气氛。

热烈的文艺节目在冷风细雨中一直持续着。整场演出是以几个剧社打擂的形式，最后还要颁奖。这将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文艺奖项，获奖的剧社领导不会因为这个奖而为自己增加政治资本，获奖的战士也不会因此而提干或得到奖金。此时大家的心里都很明白，这已是最最后一次演出，获奖也将是最后的荣誉。但是，每个战士都是在为这最后的荣誉而努力。台上的战士演得投入，台下近万名群众看得激动，演出高潮迭起，掌声喝彩声不断。

会演结束后，瞿秋白对演出的文艺节目做了点评，也为这次活动做了总结。大会的最后一项内容是瞿秋白亲自为优秀节目颁奖。我想，这应该是我们文艺界评奖史上最具有意义、最有价值、最纯粹、也最令人激动和感动的一次。这也是瞿秋白在中央苏区做的最后一件工作。这以后，大家分九路突围，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很多人都牺牲了。

“十里听歌冒雨来，辉煌灯火照山台。军民同乐逢佳节，星月联华叹妙才。东边唱罢西边和，前幕收场后幕开。披蓑张盖通宵立，三度闻鸡不肯回。云霄结彩赣江春，壮舞高歌洗战尘。夜雨绵绵弦韵急，红灯冉冉掌声频。蒸豚煮酒劳军旅，磨利擦枪待敌人。三十年来谁记得，于都情景宛如今。”这是当年中央苏区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、红军大学俱乐部主任、战号剧社领队赵品三在1962年回到井塘村时写下的一首诗。

这首诗，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当年这场会演的盛况。我在井塘村的东北面找到了这个山坳。这里地势平坦，四面是缓坡，的确很适合文艺演出。山坳里静寂无声，草木葱茏，已看不出当年的痕迹。在这个山坳不远的地方，就是当年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办事处机关办公的旧址。我走进这几间房舍。这是典型的赣南民居，大致还可以看出当年的格局。陈毅办公的房间由于年久失修，四壁已有些模糊不清。这时来了一个老人，他告诉我，他是这里的房东，当年陈毅和项英在这里办公时他见过，常来这里玩。那时他只有8岁。我问老人，还记不记得当年的那场文艺演出。老人想了想，混浊的眼睛立刻亮起来，用赣南话说，记得，当然记得哩，那个采茶戏唱得可好听啊。

老人又轻轻叹口气，喃喃地说，后来，就再也没听过这样好听的采茶戏哩……



走进星海故里

□张胜友

这是一次艺术朝圣之旅。

值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，一拨拨诗人、作家、艺术家顶礼膜拜地走进广东番禺榄核镇，去聆听一位伟大音乐家的心灵倾诉，去感悟如黄河波涛澎湃的英雄旋律。

榄核镇地处珠江口，一块浸在水里的陆地，河涌交错，水网纵横，容奇水道、沙湾水道环绕西北，南沙港、莲花山港、顺德港近在咫尺，水是榄核镇的精灵啊。据史籍记载：清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，渔民们纷至沓来，在这片水天盈盈的泽国拾贝采蚝，把废土弃于滩涂之上，潮涨潮落，冲洗堆积，昼夜不舍，滩涂上便分布出形似橄榄核土堆，橄榄核土堆联袂成片，初称作“榄核圩”，后人烟渐稠密，商业日趋盛，遂有了正式名号，曰：“榄核镇”。

洗星海的祖籍地便在榄核镇滘涌村，一派“水之涓，河之滨”田园风光，汨汨河水穿过古朴的村落，却以凄风苦雨滋养了她的一位音乐天才。洗星海是水的儿子，1905年6月13日，当他降生在一个渔船上时，无片瓦遮头，有水波簇拥，寡居的母亲黄氏仰望星空，哼唱水谣，给小小的生命取了一个灿烂的名字：星海。

黄氏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母亲。贫穷的母亲带着幼小的星海辗转漂泊在澳门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一边给人家帮佣，一边供星海上学。少年星海音乐天赋光华闪耀，先后就读于岭南大学附中、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、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等进修小提琴、钢琴。后又远赴巴黎勤工俭学，师从丹第(V.D'INDY)学提琴，师从杜卡斯(Paul Dukas)学作曲理论与作曲。在弥漫着艺术灵感的巴黎，青年洗星海创作激情如泉喷涌，《风》《游子吟》《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》《中国古诗》等作品均于留学期间问世。

1935年游子归国，祖国山河破碎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。洗星海毅然决然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，大量群众歌曲如《救国军歌》《只怕不抵抗》《游击军歌》《路是我们开》《茫茫的西伯利亚》《莫提起》《黄河之恋》《热血》《夜半歌声》《拉犁歌》《祖国的孩子们》《到敌人后方去》《在大行山上》《生产大合唱》等应运而生，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。

1938年，洗星海任延安鲁迅文艺艺术

学院音乐系主任，正是在宝塔山下、延河岸边，他与光未然合作的《黄河大合唱》横空出世，雄浑激越的旋律响彻中华大地：“风在吼/马在叫/黄河在咆哮/黄河在咆哮……”正如诗人谷禾所吟诵的：这首歌里，“有一个民族的呐喊”，“有一个民族的血泪，呼吸，疼痛”，“是一个民族挺起的脊梁”……

1945年10月30日，洗星海不幸病逝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，年仅40岁。一颗音乐巨星、东方贝多芬，经过轰轰烈烈的生命燃烧之后，光芒四射，映照华夏，又倏忽间如流星一般地陨落了……

赤子报效为国，魂兮归来在乡。洗星海又回到了生他养他、多水的榄核镇滘涌村，与故土、乡亲为伴，与春水秋波、夜空繁星厮守，永不分离。“小桥流水”式幽静的小乡村矗立起了洗星海塑像，入村的主路叫“星海路”，村内的阡陌街巷也分别以“星海街”“海生街”“星河街”命名，处处留下了洗星海的足迹与身影。

故乡的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，珠江水系与黄河水系是相通的，洗星海的人生之旅，正是怀着童年的苦难、背负父老乡亲的嘱托，汇入祖国的大江大河，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，如砥柱中流挺身而立，用黄河的咆哮掀起了撼天动地的惊涛……祖国抗日战争胜利了，民族渡过劫波重生了，洗星海又回到故乡安息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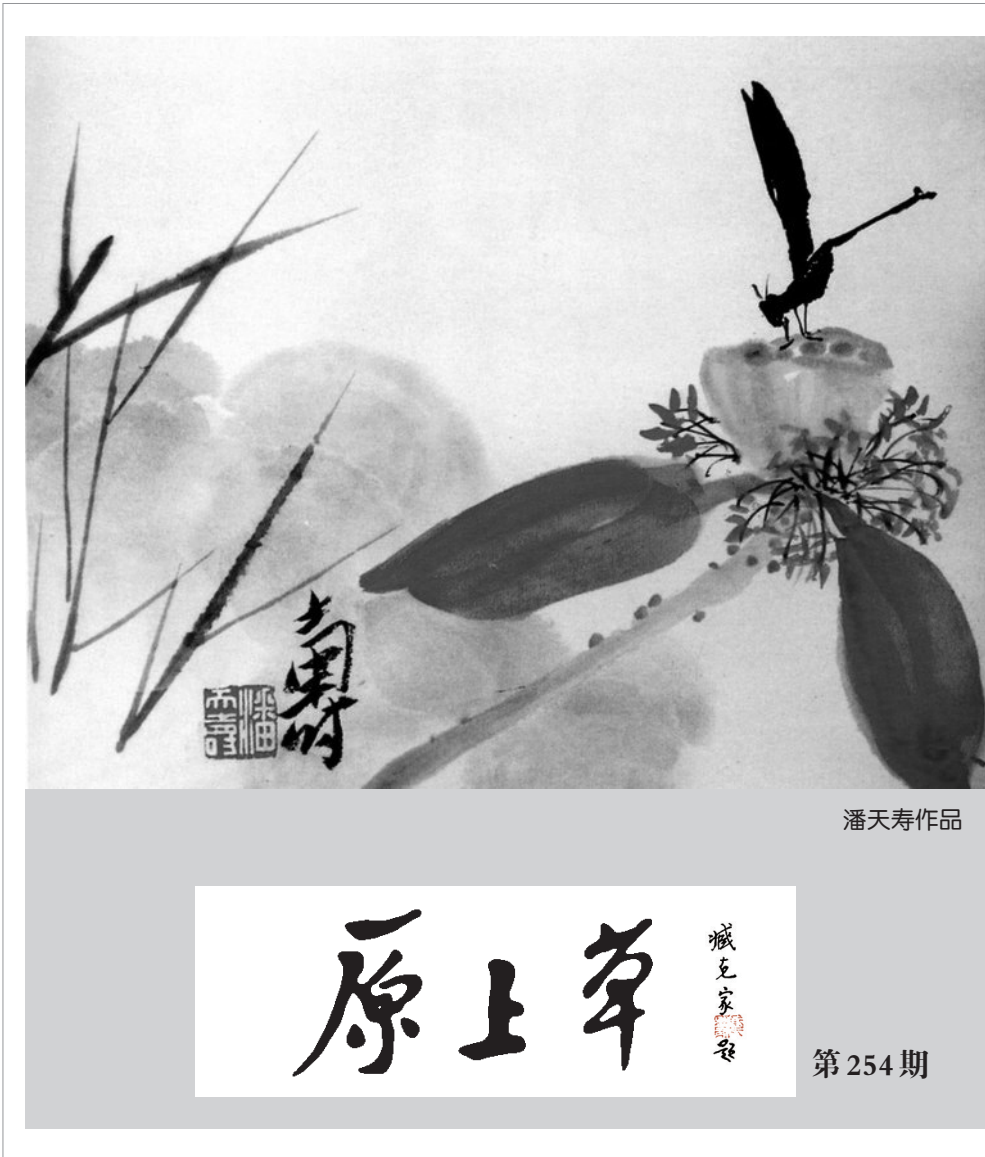
榄核镇，为养育了洗星海这样的儿子而倍感骄傲！

当我飞返北京后，传来喜讯：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（广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。2015年4月21日，广东自贸区在南沙举行隆重的挂牌仪式。

前30年，深圳特区作为“共和国改革长子”，一路披荆斩棘，闯关夺隘，创造了令全世界为之瞩目的中国式奇迹；我们可以预见，后30年，广东自贸区揽新世纪八面来风，鼓荡“一路一带”新帆帆，珠江三角洲大地必将耸立起又一个“深圳”。

榄核镇占踞珠三角平原中心区位，距深圳90公里、距珠海80公里、距广州32公里，天工造化，榄核镇将挟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之便，坐收自贸区“近水楼台”之利。

斯人有幸，洗星海先生在天之灵，当歌之舞之狂欢之，为今日故乡已汇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滚滚洪流而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

像阳光一样照耀他们

□爱斐儿

如果枪膛对战火说：“我要长出玫瑰。”
还需要多少人去再次牺牲？
如果万物都要求和平地生长，
还需要多少人，从仇恨和掠夺的欲望中觉醒？
如果所有的人，都祈望远离战争的阴影，
还需要多少人，去把这段蹉跎的年月填补？
如果战争再次让那些农夫或学子，甘愿与刽子手和鬼子同名，甘愿成为日寇和魔鬼的同义词，
还需要多少蘑菇云，去消除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刻骨仇恨？
如果眼神清澈、童声稚嫩的孩子问我：“人类为什么会有战争和杀戮？”
孩子，请让我清除内心的乌云，等我把耻辱和仇恨的芒刺修剪干净。
我会对你说：“这个世界，有许多人被黑暗包围，如果你能成为太阳，就去照耀他们吧！”